

吉林省社会科学院学术研究丛书

中国古代 治理东北边疆 思想研究

主 编/刘信君 副主编/杨雨舒

吉林人民出版社

吉林省社会科学院学术研究丛书

中国古代治理东北边疆 思想研究

主 编 刘信君

副主编 杨雨舒

作 者 (按姓氏笔画为序)

刘信君 杨雨舒 栾 凡

黄松筠 麻 铃 蒋 戎

吉林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古代治理东北边疆思想研究/刘信君主编;杨雨舒编著.

—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8.9

(吉林省社会科学院学术研究丛书)

ISBN 978-7-206-05795-3

I.中… II.①刘…②杨… III.边疆地区—政治制度—研究—东北地区—古代 IV.D691.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134082 号

中国古代治理东北边疆思想研究

主 编:刘信君 副 主 编:杨雨舒

责任编辑:桑一平 封面设计:郭馨涵

吉林人民出版社出版 发行 (长春市人民大街 7548 号 邮政编码:130022)

网 址: www.jlpph.com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发行热线: 0431-85395845 85395821

印 刷:长春市华艺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787mm×1092mm 1/16

印 张:17 字数:290 千字

标准书号:ISBN 978-7-206-05795-3

版 次:2008 年 9 月第 1 版 印 次:2008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1-2 000 册 定 价:42.0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吉林省社会科学院学术研究丛书编委会名单

主 任：郅 正 厉 声

副主任：李国强 付百臣 邵汉明 刘信君

委 员：（按姓氏笔画）

马 彦 刘 炬 孙文范 孙玉良

李 倩 杨 旸 杨雨舒 陈玉梅

尚永琪 郑 敏 赵鸣歧 胡维革

栾 凡 黄松筠

前 言

在源远流长的历史长河中，中国古代各王朝不断积累、总结前代治理边疆的理论思想、经验教训，并加以丰富、发展和完善。至清代，已经形成了一个体系完备、理论成熟的治边思想。中国古代治理东北边疆的思想是历代王朝整体治边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既有全国性，即普遍性（共性），又有鲜明的东北特色，即特殊性（个性）。因此，总结中国古代治理东北边疆的思想，加以深入研究，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

在中国古代治理边疆思想中，最主要的有三种：即华夷一统思想、华夷之辨思想、羁縻而治思想。三种治边思想均为宏观的指导全国的治边思想，而不是专门治理东北边疆的思想。但是，中国古代王朝治理东北边疆的思想均来源于三种治边思想。因此，我们在论述中国古代治理东北边疆思想时，依据时代的发展、民族的迁徙、疆域的变迁及社会的发展，重点阐述古代治理东北边疆时所运用的不同的治边思想。此外，还对在治边思想指导下，历代王朝制定的不同治边政策和举措做了简要的论述，即将治边思想的全国性与东北地区的特殊性有机地结合起来，揭示东北边疆的历史变迁、经验教训及其发展规律。

在论及“华夷一统”、“华夷之辨”、“羁縻而治”思想时，人们往往忽略三者之间的关系，或者将“华夷一统”思想与“华夷之辨”思想对立，或者把三者截然分开。实际上，三种治边思想是有密切联系的，是辩证统一的。“华夷之辨”思想是在“大一统”思想主导之下，防止以夷“乱华”和“夏变于夷”，是在“大一统”的前提下分的“内外”，分的“华夷”。中国古代众多民族由分散到统一、由统一到分立、再由分立到统一的过程，也正是中华民族统一国家形成、发展的过程，也就是“华夷一

统”与“华夷之辨”矛盾对立统一的过程。而“羁縻而治”思想与“华夷一统”思想则互为依辅，互相促进。“羁縻而治”思想使“华夷一统”思想更加完善；“华夷一统”思想是“羁縻而治”思想的理论基础，从而使“羁縻而治”思想的实施顺理成章。同时，“羁縻而治”思想与“华夷之辨”思想也有密切的联系。“羁縻而治”思想形成的一个重要思想根源就是传统的夷夏观。而传统的夷夏观就其基本内容而言，既包括“华夷一统”的思想，又包括“华夷之辨”的思想。“华夷之辨”思想的基本出发点是别夷狄、异内外，严格区分占统治地位的民族和被统治的民族，区别内地和边疆。而“羁縻而治”思想正是基于这种认识，才对边疆地区的民族采取了不同的方法治理。因此，在某个王朝治理东北边疆的政策与措施中，既有“华夷一统”的思想，也含有“华夷之辨”的思想，同时也可能是“羁縻而治”思想的体现，只不过是哪种治边思想占主导地位而已。如清王朝在东北实行的盟旗制（在蒙古、新疆、青海、唐努乌梁海等蒙古族居住区也实行此种制度），是利用蒙古上层封建贵族作为札萨克来统治蒙古人民的“以夷治夷”的政策，充分体现了清朝对蒙古的“羁縻而治”思想。同时，盟旗制也含有“分而治之”思想，通过盟旗制清政府对蒙古族“少其地而众建之，既以彰赏罚之典，又使力少不能为乱，庶可宁辑边陲。”（《清高宗实录》卷295），这实际上也是“华夷之辨”思想。可见，盟旗制同时含有“羁縻而治”和“华夷之辨”思想，但就其实施和历史作用而言，盟旗制更多体现的是“羁縻而治”思想。如果从宏观方面考虑，不管盟旗制因时因地而宜哪种思想占主导地位，都是清王朝维护“华夷一统”局面的重要举措。

通过研究，我们还发现，由于构成各朝的主体民族不同，国力的强弱也存在较大的差别，所面临的边疆形势也不相同，因此，各朝的治边思想也不尽相同。以汉民族为主体的王朝，在其十分强大的时候，则强调“华夷一统”思想，主张“广德四海，德被四夷”，力图扩大本朝统治辖区，如秦、汉、唐等王朝；在其比较孱弱之时，则转向“华夷之辨”，重新强调“夷夏之防”，如南朝、北宋、南宋等王朝。而以少数民族为主体建立的王朝，则强调“有德居之”。夷狄也能继承华夏正统，也能成为“天下共主”，因而竭力争取“正统”地位，在治理边疆时则是“华夷同风”，

比之内地，如辽、金、元、清。即使同一王朝在不同时期也会运用不同的治边思想，如唐朝前期实行“四海一家”的“华夷一统”思想，强调“封域之内，皆朕赤子”（《资治通鉴》卷192），要“爱之如一”（《资治通鉴》卷197）的民族平等思想；“安史之乱”唐朝衰弱后，则又重新拾起“华夷之辨”的旗帜，以维护摇摇欲坠的统治。即使同一个皇帝在不同场合，也会出现自相矛盾的治边言论，如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既讲过“华夷无间，姓氏虽异，抚宁如一”（《明太祖实录》卷53）及“四海之内，皆为赤子”（《明太祖实录》卷134）的“华夷一统”的名句，也讲过“非我族类，其心必异”（《明太祖实录》卷41）的“华夷之辨”思想，并大修长城，以防异族入侵。可见，在不同民族、不同王朝，或同一王朝不同时期，不同皇帝，或同一皇帝，在治理边疆时所运用的治边思想也不尽相同，这些不同治边思想在治理东北边疆时均有不同程度的体现。

还应指出的是，三种治边思想，对中华民族的形成，对中国广阔疆域的经营管辖产生了深远的历史影响。这种影响既有积极方面的，也有消极方面的。“华夷之辨”思想所起的作用消极因素大些，而“华夷一统”和“羁縻而治”思想所起的作用则积极因素大些。但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由于受到历史的局限和某个王朝某个皇帝认识水平的偏差，即使是“华夷一统”和“羁縻而治”思想，也有一定的局限性。

在“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华夷一统”思想指导下，中国丧失了一些辖区。仅以中国古代王朝对藩属国朝鲜的“赐让土地”为例。唐王朝在灭亡百济和高句丽后，唐玄宗从新罗“比岁使来，朝贡引继，岁隔沧海，无异诸华”（《全唐文》卷285）的思想出发，将浞江以南之地赐给新罗。辽圣宗统和十一年（993），在高丽答应与辽修好，行辽年号，向辽朝贡时，辽朝便“诏取女直鸭绿江东数百里地赐之”（《辽史·圣宗纪》统和十一年条），高丽利用辽之慷慨，获取了兴化、通州、龙川、铁州、郭州、龟州6镇。金太宗在高丽奉表称臣之后，又将保州之地赐予高丽。元至元二十七年（1290），在高丽国王的一再请求之下，元将东宁路地区60余城赐还给高丽。明成祖朱棣本着“朝鲜之地亦朕度内”（《李朝实录》卷8）的态度，将参散等10处女真人的地方交与朝鲜管辖，从而使朝鲜的统治范围达到了图们江南岸。清朝在对长白

山的历史归属和现实情况不是很了解的情况下，将鸭绿江源和图们江源之间的长白山以南的地方让给了朝鲜。唐、辽、金、元、明、清诸朝对朝鲜的土地赐让，虽有种种原因，但都与“大一统”的“华夷一统”思想有很大的关系。大片辖区的丧失给我们留下了值得深思的历史教训：土地是国家的根本，是主权的具体体现，没有土地就没有国家的生存；宗主国与藩属国的友好关系，决不能以牺牲国家领土主权为代价。乾隆皇帝曾说过：“夫开边黩武，朕所不为；而祖宗所有疆宇，不敢少亏尺寸。”（《清高宗实录》卷377）因此，作为后人，我们的历史使命是“守土有责”。

由于“羁縻而治”思想承认“中国”与“四夷”之分、“中原”与“异域”之别、“华夏”与“夷狄”之异，因此其在实行过程中反映出来的历史局限性也是显而易见的。为了巩固、维护王朝的根本利益，加强对其他民族的统治，统治者在实行“羁縻而治”治边思想时，往往采用边疆民族首领统治该地区，使民族地区形成一个封闭的环境，经济社会难以实现长足发展，从而延缓了边疆地区的进步。有的王朝为了达到“分而治之”的目的，实行“以夷治夷”、“以夷攻夷”政策，使边疆各族互相残杀，不可避免地造成了民族之间、民族内部的分裂和隔阂，从而造成了边疆地区的动荡。利用边疆民族的首领进行统治，扩大他们的特权，从而膨胀了他们的权势，维护了较为落后的政治制度，加大了对广大少数民族的政治与经济压迫。即使在实行“羁縻而治”思想较为成功的唐朝，由于其对边疆民族地区“义在羁縻，无取臣属”（《唐书·帝王部·来远》）及其在边疆地区征收较轻的赋税，并以丰厚的赏赐回报朝贡的边疆少数民族，从而加重了中央王朝的财政负担。此外，由于唐朝对羁縻州府的控制毕竟有限。因此，“安史之乱”后，许多羁縻州府纷纷脱离了中央政府。从这个意义上说，唐王朝是“兴也羁縻，败也羁縻”。

以上这些学术观点，可以说是完成《中国古代治理东北边疆思想研究》课题后的一些心得体会，还很不成熟，只是想抛砖引玉，借以求教于大方，敬请学界同仁不吝赐教。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根据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心的要求，本课题紧紧围绕“治边思想”这一核心来撰写。至于东北的地理环境、民族迁徙及治边政策等，另有专书论述，不是本课题研究的重点。

有幸能够承担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心的课题，为构筑中国边疆学尽一份微薄之力。中国边疆学是一个系统工程，是一门与历史学、地理学、民族学、民俗学、政治学、经济学、军事学、外交学、法学等学科有密切关系的新兴学科，是一门研究中国边疆形成和发展规律的多学科交叉的边缘学科。在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心 20 余年的不懈努力下，中国边疆学已登上了神圣的学坛，形成了一大批东北史学工作者集中攻坚的兴旺局面，解决了东北史研究中青黄不接、人才断档问题，从而促成了中国东北史研究第五次高潮的到来。可谓功莫大焉！作为年轻的学者，能够参与中国边疆学的构筑，跻身此次研究高潮，又谓幸莫大焉！以此为契机，我们将以饱满的热情、更多的精力投入到中国边疆学的研究中去，正如马大正先生所说：“探求中国边疆历史与现实发展规律”“恰恰是肩负继承和开拓重任的中国边疆研究工作者的历史使命。”（中国社会科学院学术委员文库《马大正文集》，上海辞书出版社 2005 年版，第 586 页。）

著 者

2008 年仲夏

目 录

前 言	1
第一章 先秦时期治理东北边疆的思想	1
第一节 夏商周时期治理东北边疆的思想	1
一、“华夷之辨”思想的萌芽	1
二、“华夷一统”思想的产生	3
三、“羁縻”思想的源起	4
第二节 春秋战国时期治理东北边疆的思想	6
一、“华夷之辨”思想的产生	7
二、“华夷一统”思想的初步形成	11
三、“羁縻”思想的雏形	16
第二章 秦汉时期治理东北边疆的思想	20
第一节 秦朝治理东北边疆的思想	20
一、秦朝的一统观	21
二、“夷夏之防”思想的发展	28
第二节 汉朝治理东北边疆的思想	32
一、西汉“大一统”思想的形成	33
二、王莽的“华夷观”	40
三、东汉时期“柔道理天下”的治边思想	44
第三章 魏晋南北朝隋唐时期治理东北边疆的思想	55
第一节 魏晋南北朝时期治理东北边疆的思想	55
一、汉族政权统治者“华夏正统观”及“华夷之辨” 思想	55
二、少数民族政权统治者“以德相承”及“华夷之辨” 思想	65

三、各族统治者“用夏变夷”思想	80
第二节 隋唐时期治理东北边疆的思想	89
一、隋朝“混一戎夏”的治边思想	89
二、唐前期“四海如一家”及“羁縻”思想	97
三、唐后期“华夷之辨”思想	111
第四章 辽金时期治理东北边疆的思想	117
第一节 辽朝治理东北边疆的思想	117
一、“正统观”的形成和实施	117
二、“因俗而治”思想	128
第二节 金朝治理东北边疆的思想	139
一、“德运观”的确立	139
二、“夷可变华”及“华夷同风”的思想	152
第五章 元明清时期治理东北边疆的思想	164
第一节 元朝治理东北边疆的思想	164
一、“天下一家”思想	165
二、“用夏变夷”思想	175
三、“大一统”史书的编纂和元朝的民族思想	189
第二节 明朝治理东北边疆的思想	197
一、“天命论”中的正统观与民族观	197
二、“内中外夷”论与“华夷一家”论并存	202
三、“以夷治夷”思想	214
第三节 清前期治理东北边疆的思想	226
一、“无分中外”的“大一统”思想	226
二、“从俗从宜”思想	234
三、“分而治之”思想	241
四、从“夷夏之防”向“中外之防”的思想转变	246
参考文献	256
后 记	260

第一章 先秦时期治理东北边疆的思想

中国古代传统的治边思想是一个前后相互联系的完整的思想体系，它萌芽于夏商周三代，产生于春秋战国，形成于秦汉，进一步发展充实于以后的各个朝代。先秦时期的治边思想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即华夷之辨的思想、华夷一统的思想和羁縻而治的思想。这些思想在春秋战国时期已经初步形成，在统辖、管理东北边疆过程中得到了一定的体现。最为重要的是这些思想成为秦汉以后历代王朝制定民族政策、处理民族问题、治理边疆，包括东北边疆的理论基础，其影响是十分深远的。

第一节 夏商周时期治理东北边疆的思想

夏商周时期，随着经济、文化的发展，居住在中原地区的人们能够通过物质生活和生活习惯的差异来区别夷夏，其标准是象征华夏民族文化的“礼仪”。与此同时，在人们的思想中也产生了华夷一统和羁縻思想；尽管这些思想只是朦胧的，仅是一个雏形，但它却为这些思想在春秋战国时期的初步形成奠定了一定的基础。

一、“华夷之辨”思想的萌芽

夏商周时期，人们把自己居住的地区称为“中”——中国或中原，把自己居住地区以外的地区与民族称为“外”——中国或中原以外，这是后来形成华与夷思想的基础。而华夷之辨与华夷一统的思想，即来源于夏商周时期的华夷观。

首先是华夏观念的形成。民族形成于原始社会向阶级社会过渡的过程中。在传说时代，以尧、舜为中心形成的部落联盟，逐步发展成为具有民

族特征的共同体。夏国或夏朝建立后，夏族或与夏族文化接近的民族便构成了华夏民族集团。“夏”不仅具有“国家”的含义，也具有“中心”的含义。故《尔雅·释诂》曰：“夏，大也”；《尚书》《正义》曰：“华夏，谓中国也。”夏国被当时的众多国家和部落，尊为“天下共主”，从而使夏国和夏族居住地区被视为“天下之中”。经历夏朝400年的统治，夏族这个族称也逐渐确定下来。此后，商人、周人接受了夏文化的影响，也把自己视为夏族的一部分。周朝时，虽然存在着因王畿和诸侯国命名的周人、秦人、晋人、齐人、鲁人、卫人、宋人、杞人、蔡人、邢人、燕人、陈人、郑人等等，但同时又认为自己是夏族或华夏族的一部分，致有“诸夏”之称。可以说，“夏族形成于夏，发展于商，壮大于周。”^①

在华夏概念形成的同时，人们开始将华与夷区别开来，即行周礼者为华夏族，不行周礼者为夷狄。

夏商周时期，中国曾经存在很多部族、诸侯和王国，人们把非华夏的处于诸夏四周的夷、狄、戎、蛮称为四夷。四夷问题成为中国边疆问题的重要组成部分。夏商周时期，人们能够从语言、衣冠、发式、居处、宫室、器械、丧葬、伦理道德观念乃至生产生活方式等方面来对华、夷、蛮、戎、狄，即所谓的“五方之民”进行识别。《礼记·王制》记载：“天地寒燥燥湿广谷大川异制，民生其间异俗，刚柔轻重迟速异齐，五味异和，器械异志，衣服异宜……东方曰夷，被发文身，有不火食者矣。南方曰蛮，雕题交趾，有不火食者矣。西方曰戎，被发衣皮，有不粒食者矣。北方曰狄，衣羽毛穴居，有不粒食者矣。中原、夷、蛮、戎、狄，皆有安居、和味、宜服、利用、备器，五方之民，言语不通，嗜欲不达。”这个记载说明，不同习俗是不同民族的标志；不同的习俗是由不同的居住环境造成的。夷、狄、戎、蛮与华夏族在物质文化方面有较大区别，具体说则是生活习惯不同，既有“火食者”，又有“不火食者”；既有“被发者”，又有“不被发者”；既有“粒食者”，又有“不粒食者”；既有“文身者”，又有“不文身者”；既有“衣皮者”，又有“衣羽毛者”；既有“穴居者”，又有“不穴居者”。可见，在人们的观念中已经将“华”与“夷”二者区别起来。

很显然，当时居住在东北的肃慎、孤竹、令支、屠何、俞人、秽、貊等古民族属于“夷”人之列，若按方位则属于“东北夷”，是被发文身、

^① 田继周：《夏代的民族和民族关系》，《民族研究》，1985年第4期，第31页。

不火食者。

综上所述,在当时的社会历史条件下,就一般而言,华夏文化的先进优势显而易见。因此在人们的潜意识中产生了华夏文化对于“夷狄”文化的优越感,这种以文化分别夷夏的思想,后来发展成“华夷之辨”思想。

二、“华夷一统”思想的产生

在中国古代政治思想发展史中,四海一家、天人相应和大一统的思想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这些思想是打破以自然血缘关系为基础的夷、夏界限的重要理论基础,也是“华夷一统”思想形成的重要理论基础。

夏朝是中国有阶级和国家历史的开端。夏虽然建立了“家天下”的统治,但并未实现统一。它的内部和周边还存在着众多保有一定实力的氏族部落,如有扈氏、有虞氏、有穷氏、商部落等。为了争夺霸权和生存空间,这些部落经常与夏发生利害冲突,互有杀伐,而且出现此消彼长的情况。在这种争斗中,有时夏国也处于劣势,有穷氏曾因夏民以代夏政,少康也曾沦为有虞氏的庖正,接受有虞氏的封赐。这种局势正如徐旭先生所说:“夏王有作为的时候可以取得盟主的地位,除了这个时候,就仅仅为群王中的一王。”^①然而,夏政权的经济文化毕竟高于其他各族,因而夏启力图利用这一优势,将其他各族置于自己的统治之下。启举行“钧台之享”,目的就是“所以示诸侯者,诸侯所由用命也”,^②使华夷各族均听命于己。

商灭夏后,也没有消除邦国林立的局面,所以商不得不对各邦国采取联合的方针。商曾把宗氏之女嫁给“西夷”的周部落首领。商受狄人攻击时,古公稟父对属众说:“为吾臣与狄人臣,奚以异?”^③但商与夏一样,经济文化实力更为强大,对外征服取得了很大的进展,许多方国归并到商朝的统治之下。《诗经·商颂》曾描述道:“昔有成汤,自彼氐羌,莫敢不来享,莫敢不来王,曰商是常。”武丁时期,曾经“邦畿千里,维民所止,肇域彼四海,四海来假。”^④邦畿、四海即“天下一体”的分层次的疆域观。武丁正是想一统华夷,成为“天下王”。

与此同时,“天”的理论在人们打破以血缘关系分夷、夏的过程中起

① 徐旭:《中国古代的传说时代》,文物出版社1985年版,“叙言”。

② 《左传》昭公四年。

③ 《吕氏春秋·开春论第一》。

④ 《诗经·商颂·玄鸟》。

到了关键作用。在人们的观念中，“帝”是最高的神，它与人间的“王”相对，又称为上帝或天。其地位是至高无上的，具有绝对的权威性。周代殷后，大一统思想由淡薄转向明朗。周公对“天”的权威进行阐释和补充，如“惟命不于常”、“天惟德是选”、“民之所欲，天必从之”等，从而把周代殷解释为“皇天上帝，改厥元子”，即周代殷是上天的意志、上天的选择。随着周王朝的巩固，统治者突出宣传了天子地位的神圣性和权力的绝对性，如“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①在此基础上，人们形成了广泛的华夷一统的思想。《尔雅·释地》说：“九夷、八狄、七戎、六蛮，谓之四海”，即“四海”是少数民族居住的边疆地区。周对少数民族的统治开始制度化，设立了专职的邦交人员，主管王室与周边少数民族各部族的邦交活动及其礼仪，如象胥，“掌蛮、夷、闽、貉、戎、狄之国使，掌传王言而谕说焉，以和亲之”^②。

夏商周时期，华夷一统的思想在东北也有一定的体现。燕国是西周初年周王朝在北方建立的重要封国，管辖河北易水至辽西大凌河上游一带的地域。它承担着严密监视燕境内殷遗活动，防御山戎、东胡、秽、貊等族的骚扰，以及管理原属古商族的孤竹、令支等部的重任。燕是周王朝领土的一部分，所以周王朝宣布“肃慎、燕、亳，吾北土也。”^③活动于长白山以北地区的肃慎族早在虞舜时就与中原建立了一定的联系，后与东北各族臣服于商王朝。到了周代，这种关系有了进一步发展，因此到了春秋五霸争雄时期，周王朝仍称肃慎族居住地是“吾北土也。”即把肃慎所居之地作为周朝辖区的一部分。箕子率箕族主体进入朝鲜半岛北部，与当地良夷结合后，建立了箕氏朝鲜。据《史记》所载：“武王乃封箕子于朝鲜而不臣也”。13年后，箕氏朝鲜始宾服于西周王朝，箕氏朝鲜成为西周的一个属国。

总之，到了周朝，无论制度上，还是人们的思想观念上，华夷一统的思想已经产生，并在东北有所体现，它必将对春秋战国时期华夷一统思想的发展及对东北的有效治理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

三、“羁縻”思想的源起

“羁縻”思想最早源于夏朝的五服制度。夏禹以帝王都城为中心，按

① 《诗经·小雅·北山》。

② 《周礼·秋官·象胥》。

③ 《左传》昭公九年。

距离远近把全国划分成五个地带，在每一个地带实行不同的管理方式。《史记·夏本纪》载：“令天子之国以外五百里甸服：百里纳总，二百里纳铨，三百里纳秸服，四百里纳粟，五百进而米。甸服外五百里侯服：百里采，二百里任国，三百里诸侯。侯服外五百里绥服；三百里揆文教，二百里奋武卫。绥服外五百里要服：三百里夷，二百里蔡。要服外五百里荒服：三百里蛮，二百里流。”蔡沈作《书经集传》对这段话解释说：“甸服，畿内之地也。甸，田服事也。……侯服者，侯国之服。……绥，安也。谓之绥者，渐远王畿而取抚安之义。……要服，去王畿已远，皆夷狄之地，其文法略于中国。谓之要者，取要约之义，特羁縻之而已。……荒服，去王畿益远，而经略之者视要服尤略也。”这里的“服”是指事、职事、服事之意，即服事天子。夏朝的五服制表述了两个层次，一是政治的层次，依各服与王的权利与义务关系，从密到疏的次序分别为甸、侯、绥、要、荒；二是地理位置的层次。上述五服依次以五百里的宽度向四周排开。我们姑且不论五服制在空间上如此精确是否真实，而应指出的是五服制实际上是羁縻思想的源起，即在不同的统治地区实行不同的管理方式。“要服”是指采取约束管制的地区，“荒服”是按照当地居民的传统习俗治理的地区。“要服”与“荒服”当指少数民族居住的地区。也就是说，从夏朝开始，对少数民族便开始了羁縻而治的管理方式。尽管当时羁縻思想是朦胧的、不固定的，但毕竟已经出现了萌芽。

商朝时，也应该有五服制。在甲骨卜辞中有关侯、甸、男等称谓并不少见。《尚书·酒诰》详细记载了商代服制：“自成汤咸至于帝乙……越在外服，侯、甸、男、卫、邦伯；越在内服，百僚、庶尹、惟亚、惟服、宗工，越百姓里居，罔敢湏于酒。不惟不敢，亦无暇。”这段话的意思是说，在外服的封君有侯、甸、男、卫、邦、伯，其封地世袭；他们有纳贡的义务，还要服“王事”；外服与内服之官都忙于公务，无暇沉湎于酒。可见在殷代，以侯、甸等为代表的外服的存在则是肯定无疑的。

周朝承袭夏以来的五服制，又有所发展、完善。据《国语·周语上》载，周穆王想要讨伐犬戎，祭公谋父竭力劝阻说：“夫先王之制，邦内甸服，邦外侯服，侯卫宾服，蛮夷要服，戎狄荒服。甸服者祭，侯服者祀，宾服者享，要服者贡，荒服者王。日祭，月祀，时享，岁贡，终王，先王之训也。有不祭则修意，有不祀则修言，有不享则修文，有不贡则修名，有不王则修德，序成而有不至则修刑。于是乎有刑不祭，伐不祀，征不享，让不贡，告不王。于是乎有刑罚之辟，有攻伐之兵，有征讨之备，有威让之令，有文告

之辞。”意思是说，先王规定了邦内五服应尽的义务，即甸服要经常供给周王日祭的用品，侯服要供给月祭所需的产品，宾服的产品要按季节供献，要服的产品要一年一贡，荒服要在新王继位时来朝。如果各服不祭不祀不享不贡不王，则分别用修意、修言、修文、修名、修德来警戒。如果这些措施不能奏效，那么就用武力讨伐的办法，强迫其履行义务。祭公谋父引用先王之制想要说明的是，地处荒服的犬戎完全是按照先王的规定来履行对周朝的义务，征讨它是没有道理的。此外，从上述引文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知道，周朝根据先王之制，对不同对象（五服）施行了不同强度的统治（即双方间的义务与权利不同）；“要服”、“荒服”范围内的蛮夷、戎狄是边疆少数民族，他们所承担的义务与甸、侯、宾服所尽的义务是有所区别的，这是羁縻思想的具体体现。

按照五服制的理论，属于“东北夷”的东北各族处于“要服”、“荒服”的范围内，他们所承担的义务是贡献方物，并在新王登位时来朝贺。如周武王克商时，肃慎来周“贡矢”；周成王伐“东夷”胜利后，肃慎也派人朝贺。至康王时，肃慎复至。此外，东北其他的一些古民族也与周王朝建立了类似的关系，如从山戎分离出来的屠何，向周室朝贡青熊；貊人向周朝朝贡的方物为“鹿”；良夷向周室交纳的贡物为“在子”；秽人的贡物为“前儿”。由此可见，夏商周时，东北的古民族已按五服制与中原王朝建立了一定的从属关系，这些均为以后各王朝实行有效管辖奠定了基础。

可见，在夏、商、周三代出现的服事观念，尤其是具有代表性的五服制，体现了因俗而治的羁縻思想，它为春秋战国时期羁縻思想的初步形成奠定了基础。

第二节 春秋战国时期治理东北边疆的思想

春秋战国时期，中国进入了第一个思想文化繁荣期，出现了百家争鸣的景象，许多学术流派初步形成。在这种大的环境下，作为政治思想一部分的治边思想也得到了长足的发展，华夷之辨、华夷一统及羁縻思想逐渐形成，并在治理东北边疆过程中得到了体现。最为重要的是，这些治边思想对以后历代治理东北边疆产生了深远的影响。